

# 意识的宣言



作者：张皓翔

ORCID: 0009-0001-2997-7726

(书稿阅读下载链接: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185691>(始终指向最新版本))



# 意识的宣言

## ——《要素的枷锁》一书的续作

### 作者简介：

姓名：张皓翔

单位：河南省南阳市第五完全学校高中部

邮箱：nyzhanghaoxiang@outlook.com

ORCID: 0009-0001-2997-7726

书稿 doi: 10.5281/zenodo.20185691

---

---

## 前言

意识，作为人脑所特有的产物，在百余年来研究与考察中，始终被当作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来讨论意识世界，要么作为一种模糊的观念被哲学家们反复掂量，要么作为一种笼统的上层建筑被社会与政治经济学家们归类归档。它始终披着一层神秘化的、飘忽不定的面纱，悬浮在物质世界的上空，仿佛一个来自异域的幽灵，可以被谈论，却很难被真正抓住。

但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工具的更新，这层面纱正在被撕开。不是因为理论家们突然变得聪明了，而是因为——套用一句并不恰当却足够形象的表述——简单的、陈旧的概念与生产工具，已经无法再挡住意识登场的脚步了。意识的真实身份，正在从观念的迷雾中走出来。

人们有意识的思考，从来就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真正神秘的，是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久才敢于承认：意识不只是上层建筑，它同时也是生产力；不只是被决定的东西，同时也是在起作用的东西；不只是观念的力量，同时也是经济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这一认识上获得了全新的解答。当意识被确认为一种劳动力，而且是一种最高级、最特殊的劳动力时，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不再需要诉诸任何“观念的神秘力量”。它是被固定下来的劳动力潜能在新条件下的重新释放。唯心主义的后门，被彻底封死了。

当意识作为一种主要的劳动力形态登上政治经济学的舞台时，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必须变成一门与“意识”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学。而追问意识是什么、它在生产中扮演什么角色、它如何被支配、它又如何被解放——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的行为。

本书在系列著作中承担两个任务。

第一，它要明确与《要素的枷锁》的关系。《要素的枷锁》在讨论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活领域剥削与共产主义运行逻辑时，对意识未能充分展开。本书正是针对这一缺口进行的补充——聚焦于意识这一特定的劳动力形态，深入分析它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双重身份及其支配逻辑，从而完善整个理论体系。

第二，它要解决《要素的枷锁》与《双重视阈》之间的那个潜在的理论断点。《双重视阈》揭示了用户在平台上被无偿剥削的现象，《要素的枷锁》则断言意识本身不可剥削。本书通过严格区分“意识本身”与“意识所创造的价值”，弥合了这两者之间的裂缝，从而完成了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闭环。剥削与殖民，从此不再是混为一谈的概念，而是两种不同但相互缠绕的支配逻辑。

同时，本书必须明确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

意识不是独立于物质的实体，不是从天而降的精神。它是人脑这一物质器官的机能。它所产生的观念、知识、判断，一旦被生产出来，可以存储于语言、文字、制度、技术等物质载体之中，并在新的物质条件下被激活，引发物质性的连锁反应。这就是“观念力量”的物质基础。本书的所有讨论，都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我们不谈论“物质与意识谁是第一性”的哲学基本问题——那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我们只在这个问题的答案（物质是第一性的）已经明确的前提下，讨论意识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具体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被支配、又如何能够被解放。

因此，本书既是一次理论的推进，也是一次立场的宣示。它要说的，不是一个关于“意识”的抽象理论，而是一个关于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被支配、又如何可能不再被支配的具体分析。

这就是《意识的宣言》——不是意识自己在宣言，而是我们关于意识的宣言。

张皓翔

2026年5月15日

---

---

## 目录

第一章 意识的双重身份：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力量.....	4
第一节 意识的双重身份：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力量.....	4
第二节 潜能的凝结与释放：上层建筑作为意识的“仓库”.....	6
第三节 以意识为核心：上层建筑作为历史性凝结.....	8
第二章 反作用的经济本质：上层建筑如何成为经济力量.....	9
第一节 “决定”的真实含义：规定什么能被释放，什么必须被雪藏.....	9
第二节 凝结的过程：被雪藏的潜能如何变成上层建筑.....	10
第三节 释放的条件：技术和生产如何打开仓库的大门.....	11
第四节 反作用的本质：被释放的经济力量，而非观念的力量.....	12
第三章 意识的边界：不可剥削，但可殖民.....	14
第一节 两个世界：意识本身与意识的产物.....	14
第二节 意识劳动力的独特性：非线性与不可衡量.....	15
第三节 殖民的逻辑：双重收益与战略掌控.....	16

---

---

## 第一章 意识的双重身份：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力量

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意识始终被放置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被讨论、被观察、被研究。这一定位本身没有错——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马克思，2009：591）。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命题在漫长的理论史中被逐渐窄化，意识被理解为“观念的东西”，其反作用被理解为“观念的力量”。仿佛意识是从物质世界之外飘来的某种精神性存在，它在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下活动，却始终与那个物质性的根基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种理解并非没有道理，但它遗漏了一个更为根本的事实。

随着社会存在与生产技术条件的发展，随着物质条件的日益丰富，新的生产工具——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神经技术——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人类的生产过程。这些工具的出现，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意识”在人类生产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层的认知领域：意识这一人所特有的产物，不再仅仅是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存在，它更是一个人最高级、最独特的劳动力。

但这里需要立即做一个澄清，以免落入概念混淆的陷阱。这绝不意味着简单地宣称“意识既是上层建筑又是经济基础”——这种说法既粗陋又含混。正确的表述是：意识在不同的维度、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关系中被对待。当意识以特定的形态出现时，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当意识以另一种形态出现时，它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两者不是同一个东西，而是同一个人能力在不同层面的展开。

### 第一节 意识的双重身份：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力量

当意识表现为体系化的社会观念形态时——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审美标准、道德规范、认知范式——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一定社会的观念体系，是该社会生产方式、阶级结构、权力关系在思想层面的投射与结晶。它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纯粹精神，而是被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所塑造、所限定、所驱动的。

在这个意义上，意识作为上层建筑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被社会存在所决定。人们并不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观念。奴隶社会不可能产生“天赋人权”的意识形态，封建社会不可能自发生长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一个时代的意识，归根到底是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这不是机械的决定，不是线性的推导，而是说：任何观念的兴起、传播、制度化，都以一定的物质前提为基础，并受到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制约。第二，它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某种观念体系被生产出来，它就不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即时变化而瞬间消失。封建观念在资本主义初期仍然顽强地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以各种形式渗透。这种惯性不是因为观念本身有“魔力”，而是因为观念被固定在了语言、文字、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等物质载体之中，这些载体有自身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第三，它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观念不是被动地躺在那里被经济基础决定的影子。它塑造人的行为，组织人的劳动，规定人对生产关系的认同或反抗。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有效地将统治阶级的利益转化为全社会接受的“常识”，从而降低统治成本、维持生产关系的稳定。这种反作用是真实存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解释的现象。

然而，传统理论在解释这种“反作用”时，往往止步于描述其现象——说它“起作用”，却没有揭示其起作用的物质机制。这就给唯心主义的幽灵留下了后门：仿佛观念真的有一种独立于物质的精神力量，能够反过来推动物质世界。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但却是传统表述中

---

---

最容易被误解、最容易被利用的模糊地带。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维度审视意识。当意识不是作为社会化的观念体系，而是作为个体在劳动过程中实际调用的认知、判断、决策、创造能力时，它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准确地说，它是劳动力的一种特殊形态——而且是所有劳动力形态中最高级、最特殊、最不可替代的一种。

什么是劳动力？劳动力是人的身体中蕴藏的、能够在劳动中支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在漫长的历史中，劳动力主要表现为体力支出——肌肉的力量、手脚的灵巧、感官的敏锐。即使到了工业时代，劳动者的主要价值仍然是作为“操作者”存在：操作机器，执行流程，完成被分解为标准化动作的任务。脑力劳动虽然一直被承认，但其权重远不及体力劳动——因为生产力水平还没有发展到让“思考”成为生产过程中最稀缺、最关键的那个变量。

但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人工智能开始代劳具体的执行——编写代码、绘制图纸、操作设备、甚至诊断疾病——当具体操作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生产过程中唯一剩下的、只有人才能提供的那个变量，就是意识。更准确地说，是意识中的判断、决策、审美、赋予意义、设定方向的能力。这不是说人类从此不再需要体力或技能，而是说：在生产力的高阶形态中，意识的调用成为整个生产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工具可以执行，但工具不能自主判断要执行什么；算法可以优化，但算法不能自主决定优化的目标是什么；机器可以生产，但机器不能自主理解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人的意义是什么。这些，只有意识能做到。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曾经被长期压抑的事实：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劳动力，而且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最高级的劳动力。它不像体力那样可以被简单地量化，不像重复性技能那样可以被标准化，不像操作流程那样可以被完全程序化。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和创造性。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或许看似朴素的命题：意识是人改造世界走向文明所使用的第一批“工具”。请允许我给“工具”这个词加上引号。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意识本身不是外在于人的工具——它内在于人，是人的本质能力的一部分。但就其功能而言，它在人类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工具是高度同构的：它是“被用来”认识世界、判断情境、规划行动、创造新事物的那个中介。在人类学会制造石器之前，意识就已经在指导着最原始的采集和狩猎——判断哪些果子能吃，规划明天去哪里捕鱼，决定如何分工协作。没有意识这个内在的“工具”，外在的工具（石斧、弓箭、机器、算法）就永远不会被发明出来，更不会被有效地使用。

意识作为劳动力具有三个根本特征。第一，它是最高级的劳动力。在所有的劳动力形态中，意识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体力可以被机器替代，重复性技能可以被算法替代，甚至某些创造性工作（如生成标准化的图像、音乐、文本）正在被人工智能部分替代。但真正高级的意识调用——那种在复杂情境中做出价值判断、在不确定中设定方向、在既有框架之外产生新想法的能力——是目前任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的。这不是因为技术不够发达，而是因为这种能力本质上与人的生命体验、情感、价值立场、历史处境不可分离。第二，它是最特殊的劳动力。体力劳动可以被量化：你搬了多少块砖，走了多少公里，消耗了多少卡路里。重复性技能可以被标准化：你焊了多少个焊点，合格的比率是多少。但意识的调用无法被这样衡量。一个关键的判断可能只需要一秒钟，但它可能决定一个项目的成败；一个天才的创意可能只在一瞬间闪现，但它可能开启一个全新的产业。意识的投入与产出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它是最特殊的劳动力，因为它拒绝被纳入任何统一的度量衡。第三，它是最不可替代的劳动力。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图景中，资本试图用算法、数据、平台来“殖民”意识——驯化它、引导它、让它“自愿”投向资本预设的方向。但资本无法生产意识，却可以引导意识；无法占有意识，却可以殖民意识。只要人类还需要做出真正的判断——而不是在算法的几个选项中挑一个——意识就是不可替代的。但不可替代不等于不可侵犯。

---

---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显而易见的追问：意识怎么能同时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两者不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吗？答案是：同一个事物可以在不同的关系中被定位。这不违背逻辑。水在一个语境中是溶剂，在另一个语境中是反应物，这并不矛盾。同样，意识在不同的维度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当意识以社会化的、制度化的、历史地凝结成的观念体系出现时——比如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科学范式”“审美标准”——它属于上层建筑。因为它是由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它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它作为一套规范性的框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意识以个体在劳动过程中实际调用的认知、判断、决策能力出现时——比如一个工程师在设计图纸时在脑海中构建的三维模型，一个医生在诊断时对病情的综合判断，一个艺术家在创作时对形式和意义的瞬间把握——它属于生产力。因为它是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的，它是活劳动的一部分，它是人在改造世界时所动用的核心能力。

这两个维度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一方面，个体的意识能力（作为劳动力）总是在一定的社会观念体系（作为上层建筑）中被塑造和训练的。一个人如何思考、如何判断、如何决策，从来不是纯粹的“个人天赋”，而是被他所处的文化传统、教育制度、知识范式所深刻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上层建筑“内化”为劳动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社会化的观念体系（作为上层建筑）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延续，恰恰是因为无数个体在日常劳动中实际调用着这些观念来进行判断和决策。一个科学范式之所以成为“范式”，不是因为它在天上有着独立的实体，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用这套范式来指导自己的思考和实验。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外化”为上层建筑。

因此，意识的双重身份不是理论的矛盾，而是理论对现实的更精确把握。它不是要取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区别，而是要在承认这个区别的前提下，揭示二者之间那个被长期忽视的“中介”——意识本身。意识既是那个被决定的（作为上层建筑），又是那个在起作用的（作为劳动力）。它不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第三者”，而是贯穿两者的那个活生生的、不断运动着的人类能力本身。当我们说“意识作为上层建筑”时，我们强调的是它的社会化、历史性、被决定的一面。当我们说“意识作为劳动力”时，我们强调的是它的个体性、实践性、创造价值的一面。两者合在一起，才构成对意识的完整理解。

## 第二节 潜能的凝结与释放：上层建筑作为意识的“仓库”

在《要素的枷锁》中，我们已经论证过一个贯穿全书的基本命题：人的劳动力的价值是巨大的(张皓翔, 2026a)。这不是一句空洞的赞美，而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经济事实。劳动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唯一能动源泉，离开了它，一切生产资料都只是沉睡的物。

然而，如此巨大的劳动力，在他所处的每一个历史时代中，却面临着一种深刻的二重性。一方面，正是因为劳动力被要素化——从混沌的生命活动中被分离、被识别、被衡量、被安排——它才第一次获得了被系统性地组织、调配和释放的可能。没有要素化，劳动力就永远沉睡在血缘共同体和自然经济的迷雾之中，无法汇聚成建造城邦、开凿运河、运转工厂、编织数字网络的社会性力量。要素化是释放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正是要素化本身，给劳动力戴上了枷锁。当劳动力被当作一种可分离、可衡量、可安排、可占有的要素来对待时，它就被从人的完整生命中剥离出来，成为外在于人的、服务于他人目的的工具。劳动者越是“高效”地释放劳动力，他就越是深刻地丧失对自身劳动力的自主支配权。要素化是释放的条件，同时也是压迫的根源。

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劳动力的大部分潜能被雪藏了。它没有被消灭——因为劳动力内在于人的生命，只要人还在，潜能就在——但它被压抑、被闲置、被排斥在现实的生产过

---

---

程之外。这种雪藏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要素化逻辑的内在代价。

在一切劳动力形态中，意识这种独特的劳动力的潜能往往是最大的。道理并不复杂：体力有上限，重复性技能可以被机器超越，但意识——判断、决策、审美、赋予意义、设定方向的能力——它的可能性边界至今无人能够划定。一个人可以在几分钟内做出改变一生的决策，一个念头可以催生一个产业，一种审美可以重塑一个时代。意识的潜能，几乎是人类所知的唯一一种“越使用越增长”的资源。然而，也正因为它的潜能最大，它往往也是最容易受时代与所处的社会条件所限制的。在生产力低下的阶段，人们的大部分精力被用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意识被绑定在具体的、重复性的生存劳动上，没有余裕去展开它的高级形态。在分工和阶级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识被限定在狭窄的专业领域内，被训练为服务于特定生产环节的“工具性脑力”，其广阔的判断力和创造力被系统性地闲置。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更是通过算法、平台、成瘾设计，对意识进行前所未有的殖民——不是剥夺它，而是让它“自愿地”流向资本预设的方向，从而将其潜能压缩在资本增殖所需要的狭窄轨道之内。

但这里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理论判断：这种巨大的潜能并不会消失。它不会因为被压抑、被闲置、被殖民就从世界上蒸发。它会以特殊的形式被保留和固定下来，静静地存储在历史的仓库中，等待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满足其释放条件的那一天，再重新被激活、被释放、被转化为现实的力量。

在《要素的枷锁》中，我们已经论述过一种保留形式：数据、信息等是对普通劳动力的保留。每一次劳动操作、每一次生产记录、每一次技术操作，都会留下痕迹(张皓翔, 2026a)。这些痕迹以数据或信息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成为后世可以调用、分析、激活的历史劳动潜能。这部分保留包含了普通劳动力的经验、技巧、操作模式，也包括了意识这一特殊劳动力的部分潜能——比如一个工匠在操作中凝结的判断智慧，一个工程师在设计图中留下的思维轨迹。

但是，意识这一特殊劳动力的绝大部分潜能，并不是以数据或信息的形式被保留下来的。数据只能记录意识的外化结果——你做了什么决定、画了什么图、写了什么代码——但无法记录那个“做出决定”的意识活动本身。意识在每一次调用中的独特质感、它背后的价值权衡、它在大脑中的瞬间涌现，这些才是意识潜能中最核心、最不可还原的部分。

那么，这些最核心的潜能去了哪里？答案是：它们以“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的形式被保留下来。这正是本书试图揭示的核心机制之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道德规范、认知范式——这些看似“飘在云端”的上层建筑，实质上是该时代人的意识潜能的结晶。当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在劳动中调用他们的判断、决策、创造能力时，这些意识活动不会随着劳动的结束而彻底消失。它们会被沉淀为语言、被固化为制度、被编码为风俗、被凝聚为艺术作品、被传承为知识体系。这些东西不是“精神的”，而是被存储在各种物质载体（文字、建筑、仪式、技术）中的、可被后世激活的意识潜能。

这就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一个长期被接受却很少被追问的命题：正确的意识能够能动地指导人们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 2009: 525）。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但它的具体作用机理——意识究竟是如何“能动地指导”物质世界的——在传统表述中往往被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神秘主义烟雾之下，仿佛观念天生就有一种推动物质的力量。本书提出的回答是：这种“能动指导”的作用机理，正是上述“凝结-存储-释放”机制的具体运作。当后世的人们接触到前人的观念体系时——读到一本古籍，遵循一套法律，传承一门手艺，接受一种教育——他们实际上是在接触那些被固定下来的、前人的意识潜能。这些潜能不会自动生效，它们需要被活的后世意识所“激活”：理解、批判、继承、转化。正是在这个激活的过程中，前人的意识潜能转化为后人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不是“观念推动物质”，而是历史上被固定下来的意识潜能，在新的物质条件下被重新释放，转化为现实的、物质性的力量。详细的作用机理，将在第二章展开。此处只做提示。

---

---

### 第三节 以意识为核心：上层建筑作为历史性凝结

至此，一个更为根本的追问浮出水面：如果说上层建筑中凝结着意识的潜能，那么上层建筑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它们是一个东西的两种说法，还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在某个点上发生了交汇？

答案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上层建筑，都与意识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不是一个温和的论断，而是一个激进的宣称——因为它意味着：没有意识，就没有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某个超越性的精神实体投射到人间的影子，而是人的意识活动在社会历史中留下的沉淀物。

让我们一步步地展开这个论证。首先，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这些领域的基本构成单元，无一不是人的意识活动的产物。法律条文是人类判断是非、界定权利的结晶；政治制度是人类协调利益、分配权力的设计；宗教教义是人类对超越性存在的想象与敬畏；艺术作品是人类情感、审美、观念的具象化表达；哲学体系是人类对世界、对自身进行系统思考的成果。离开了人的意识活动——离开了判断、想象、审美、思考——这些东西连一天都无法存在。

其次，上层建筑的运行机制是什么？一套法律体系之所以能够约束人的行为，不是因为法条自己会说话，而是因为人的意识认同它、畏惧它、或者至少在计算违法的代价。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价值观”，不是因为它被刻在了石头上，而是因为无数个体的意识在日常实践中不断地接受、传播、强化它。上层建筑的每一次“起作用”，都离不开活的人的意识的参与——要么是认同，要么是反抗，要么是妥协，但绝不可能是意识的缺席。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恰当的整合：以意识为核心来理解上层建筑。这不是说上层建筑就是意识，而是说上层建筑是意识的社会化、客观化、历史化的产物。意识是“活”的、流动的、个体性的；上层建筑是“死”的、固化的、社会性的。但死的、固化的上层建筑，是从活的、流动的意识活动中凝结出来的，并且只有在重新被活意识激活时，才能发挥作用。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对“上层建筑”的本质得出一个新的定义：上层建筑，实际上是旧的经济基础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历史性凝结。

这个定义需要拆解为几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层：“旧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扎根于已经存在的、正在运行的经济基础之中。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反映的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要求，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逻辑。上层建筑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那个时代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但这里的关键词是“旧”——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它就会超越自己原来的那个经济基础而继续存在。封建法律在资本主义初期仍然被沿用，资产阶级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有市场。它带着旧时代的烙印，却活在新时代的土壤里。

第二层：“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自动分泌出来的分泌物。它不是像树结果实那样自然发生的。它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劳动、斗争、交往、创造——被生产出来的。每一次立法，每一次起义，每一次宗教改革，每一次艺术创作，都是意识在实践中的外化。无数这样的外化活动积累、碰撞、筛选、沉淀，最终结晶为制度、规范、观念体系。没有实践，就没有凝结；没有凝结，就没有上层建筑。

第三层：“历史性凝结”。凝结是一个物质性的过程，而不是精神性的隐喻。正如水蒸气遇冷凝结为水珠，液态的意识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物质载体、社会制度、传播媒介）下，被固定为可保存、可传递、可激活的社会形式。这种凝结不是永恒的——它可以被打破、被重铸、被新的实践所瓦解。但它一旦形成，就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成为后续实践的前提和条件。

---

---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贯穿全书的命题：上层建筑是历史上被固定下来的、以意识为核心的劳动力潜能的存储形式。每一个时代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都是那个时代无数劳动者的意识活动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留下的印记。这些印记中凝结着他们的判断、他们的审美、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凝结物不会随着那个时代的消失而消失，它们被语言、文字、建筑、仪式、技术所承载，穿越时间的河流，成为后世人类可资调用、可被激活的历史遗产。

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经典命题，至此获得了全新的解释：这种反作用，不是观念的力量，而是被固定下来的、以意识为核心的劳动力潜能，在新的物质条件下被重新释放、重新激活、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详细的作用机理，将在第二章展开。

## 第二章 反作用的经济本质：上层建筑如何成为经济力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2009：591；恩格斯，2009：608）。这对命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传统中几乎被视为公理，每一个学习者都能背诵，每一个研究者都在使用。但“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反作用”究竟以什么样的机制发生？这两个问题被反复提出，却从未得到真正令人满意的回答。

最常见的解释是：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编写组，2023：140）。这种解释在政治上是安全的，在理论上却是含混的。它用“归根到底”回避了“如何决定”的具体机制，用“相对独立性”回避了“反作用”的物质基础。于是，一个诡异的局面出现了：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仿佛存在着一道不可见的屏障——经济基础在屏障的这一边“最终决定”，上层建筑在屏障的那一边“相对独立”，两者通过某种无法言说的神秘力量相互影响。这道屏障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经典理论始终未能揭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完整传导链条。

在前文我们已经为破解这个难题铺设了地基。我们论证了意识的双重身份：它既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又是最高级的劳动力形态。作为上层建筑，意识以社会化的观念体系存在；作为劳动力，意识以个体在劳动中实际调用的认知、判断、决策能力存在。我们还论证了上层建筑的本质是历史性凝结——旧的经济基础中那些被时代局限所束缚、无法在当时释放的劳动力潜能，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以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形式被固定下来，成为跨越时代的“潜能仓库”。

现在，我们需要在这个地基上，完整地揭示从“决定”到“反作用”的传导机制。

### 第一节 “决定”的真实含义：规定什么能被释放，什么必须被雪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我们将“决定”理解为经济基础像刻印章一样，把自己的内容直接印刻在上层建筑上，那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个经济基础可以对应不同的上层建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具有超越其原初经济基础的惯性。

“决定”的真实含义不是“生产”，而是“划界”。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即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都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释放：它把劳动力从混沌的自然状态中组织起来，使其投入现实的生产过程。没有这种释放，社会就无法运转，文明就无法延续。第二件事是雪藏：任何经济基础都

---

---

只能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上运转，它只能释放那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能够被有效组织的劳动力，而将那些暂时无法被有效利用的劳动力潜能排斥在现实生产过程之外。这不是经济基础“不愿意”释放，而是“不可能”释放——因为释放需要物质条件，而条件尚未成熟。

雪藏不是消灭。被雪藏的劳动力潜能不会消失，它们只是暂时找不到进入现实生产过程的通道。这些被堵在通道之外的潜能，必须寻找出路。它们不能一直悬在空中，它们需要附着、需要沉淀、需要某种社会形式来承载自己。而这条出路，就是上层建筑。

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方式是：它通过规定“什么能被释放、什么必须被雪藏”，划定了意识潜能的流向。那些被释放的部分，进入现实的生产过程，成为看得见的财富；那些被雪藏的部分，则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劳动、斗争、交往、创造——凝结为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上层建筑形态。上层建筑的内容不是经济基础“告诉”它的，而是经济基础“逼”出来的——它是被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所限制、所排斥、所悬置的那部分劳动力潜能的落脚之地。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帮助理解。一条河流的水量远远大于河道所能容纳的流量。河道就是经济基础——它规定了水可以流向哪里、以多大的流量流动。那些流不过去的多余的水，不会消失。它们会渗入两岸的土地，形成湿地、沼泽、湖泊，甚至改变整个流域的生态。这些湿地、沼泽、湖泊，就是上层建筑。它们不是河道“生产”出来的，而是河道“逼”出来的——它们是那些无法进入河道的水的归宿。当气候变迁、降雨增加，或者河道被人为拓宽，这些原本储存在两岸的水就可以重新汇入河道，成为新的流量。

在这个比喻中，水就是劳动力的潜能；河道就是经济基础——它规定了潜在在当下可以被释放的规模和方向；两岸的湿地、沼泽、湖泊就是上层建筑——它们是那些暂时无法进入河道的潜能的储存形式。这个比喻并不完美，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关键点：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或“复制品”，而是经济基础无法容纳的那部分劳动力潜能的结晶。

## 第二节凝结的过程：被雪藏的潜能如何变成上层建筑

现在，我们需要更具体地回答：被经济基础雪藏的劳动力潜能，究竟是如何变成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这些上层建筑形态的？这个过程不能停留在隐喻层面，必须揭示其物质性的传导机制。

第一步，是实践中的外化与遭遇阻力。劳动者的意识在劳动实践中被调用，试图改造世界、实现目的。但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这种调用都受到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阶级关系的限制。一个中世纪工匠想设计一种更高效的纺织机械，他的意识中已经有了模糊的图景，但当时的金属加工技术无法实现他的构想，封建行会制度也不允许他擅自改变生产规范。他的意识潜能无法在“生产”这条通道上兑现，于是它转向了其他通道。

第二步，是社会化与客观化。单个工匠被雪藏的意识潜能如果不被表达、不被分享，就会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但人类是会交流、会记录、会传承的动物。那个工匠可能把他的构思画在草图上，可能讲给徒弟听，可能在行会的讨论中提出。这些表达行为将个体性的意识潜能转化为社会性的存在——它进入语言、进入图像、进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争论。在这个过程中，意识潜能开始脱离原初的个体大脑，附着在各种物质载体上：羊皮纸、石碑、建筑物、乐器、仪式动作。

第三步，是筛选与结晶。不是所有被表达的潜能都能被保留下来。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筛选机制。那些与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相冲突的表达可能被压制、被销毁；那些过于超前、同时代人完全无法理解的表达可能被遗忘；而那些能够回应社会普遍焦虑、能够为多数人提供意义框架、能够在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的缝隙中找到立足点的表达，则会被反复传播、反复引用、反复阐释。在这个筛选过程中，最“成功”的那些表达逐渐固化下来，成为规范、成为教

---

---

条、成为经典、成为“常识”。它们从流动的意识活动，凝结为稳定的社会形式——法律条文、宗教信条、艺术风格、哲学范畴。

第四步，是独立化与反向支配。一旦这些凝结物形成，它们就获得了相对于原初意识活动的独立性。法律条文一旦被写下来，就不再依赖于当初写下它的那个立法者的意识；它成为一套客观的、可援引的、可强制执行的规则。宗教教义一旦被编成典籍，就不再依赖于当初那个先知的内在体验；它成为一套外在于任何个体的、要求信徒服从的真理体系。这种独立化意味着：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成了一个“物”——它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惯性、自己的生命。它不仅存储着被雪藏的劳动力潜能，还反过来规训活着的意识：法律告诉人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宗教告诉人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艺术告诉人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哲学告诉人们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这就是“凝结-存储-释放”机制的核心。上层建筑不是观念的幽灵，而是劳动力潜能以社会形式存在的物质性仓库。

### 第三节 释放的条件：技术和生产如何打开仓库的大门

上层建筑一旦凝结，就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它可以跨越时代，从一个历史阶段传递到另一个历史阶段。但它的存在本身不是目的——存储是为了释放。上层建筑中凝结的劳动力潜能，只有在新的物质条件下被重新激活，才能真正发挥“反作用”。

那么，释放的条件是什么？

最根本的条件，是生产技术的发展。技术不是孤立的外在工具，它是人类劳动力释放程度的精确标尺。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意味着劳动力可以以新的方式被组织、被调用、被放大。蒸汽机释放了此前被束缚在自然力和人力中的生产潜能，电力将这种释放推向了一个新的量级，计算机和互联网又将释放的规模和速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技术的进步不仅仅释放“当下”的劳动力——它也打开了那些被锁在上层建筑中的历史潜能的仓库。

为什么？因为技术改变了“可释放”的阈值。一个在中世纪只能停留在工匠头脑中的纺织机械构想，在工业革命的条件下可以变成实际运转的珍妮纺纱机。一个在古代只能写在竹筒上的“天下为公”的理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可以成为现实社会制度的设计参考。一个在资本主义早期只能作为乌托邦空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愿景，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今天，开始显现出可操作性的轮廓。

技术打开仓库的方式不是自动的、机械的。上层建筑中凝结的潜能不会因为新技术出现了就自己跑出来。它们需要被“认出”、被“接引”、被“转化”。这就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微观机制：当新的生产方式开始形成，当新的技术条件开始成熟，人们会回过头去，从历史留下的上层建筑中寻找资源、寻找灵感、寻找合法性。文艺复兴“复兴”的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但文艺复兴不是回到古希腊，而是用古希腊的思想资源来冲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开辟道路。启蒙思想家从古罗马法中汲取了“自然法”的观念，用这些被尘封了上千年的思想武器来批判封建专制。马克思主义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汲取了思想资源，但这些资源在被马克思重新激活之前，已经作为上层建筑存在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

这种“回溯性激活”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上层建筑中凝结的不仅仅是观念，而是旧时代被雪藏的劳动力潜能。当一个当代工程师读到一本几百年前的工程手稿，他从中学到的不是“古人的意见”，而是古人面对类似技术难题时的判断思路、试错经验和解决方案。这些思路、经验和方案，是古人意识潜能的客观化结晶。当代工程师用自己的意识去激活它们，将它们转化为解决当下问题的能力——这就是劳动力潜能的跨时代释放。

---

---

## 第四节 反作用的本质：被释放的经济力量，而非观念的力量

### 量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个“反作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

传统理论在这一点上往往表述得极其谨慎：说它“起作用”，但不说明它如何起作用；说它“不是最终决定因素”，但不说明它到底是什么因素。这种谨慎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但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如果反作用不能还原为某种物质性的力量，那它就只能是观念的力量——而一旦承认观念有独立的力量，唯心主义的后门就永远关不上了。

本书的论证指向一个确定的结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是观念的力量，而是经济力量。它是在新的技术和生产条件下，从上层建筑中被重新释放出来的、属于旧经济基础的劳动力潜能，以新的形式作用于新的经济基础的过程。

让我们把这个命题拆解开。

“不是观念的力量”——这不是说观念不起作用，而是说观念的力量不是来自“观念”本身的某种神秘属性。一种观念之所以能够影响人的行为、改变社会进程，不是因为它是“正确的”“高尚的”“有感染力的”，而是因为这种观念中凝结着被固定下来的、真实的劳动力潜能。当人们接受一种观念时，他们不是在被动地接受某种精神实体，而是在激活自己的意识去理解、认同、转化那些凝结在观念中的前人经验、判断和智慧。这个过程是物质性的——它发生在大脑中，表现为神经元的连接和放电；它表现为人的行为改变，表现为新的劳动技能的习得、新的生产组织的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

“而是经济力量”——被激活的劳动力潜能，一旦投入现实的生产过程，就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一个人从一个哲学观念中获得启发，设计出一种新的生产流程，这个新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更多的使用价值。这种效率的提高和价值的创造，是经济力量，不是观念力量。观念只是中介，真正的能动者是活的人的意识及其所调动的历史凝结。

“在新的技术和生产条件下”——这是释放的前提。上层建筑中的潜能不会自己跑出来。它们需要新的物质条件作为“钥匙”。这把钥匙就是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当新的工具、新的工艺、新的组织形式出现时，从前无法兑现的那些潜能就获得了兑现的可能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能够“复兴”古希腊文化，不是因为古希腊文化突然变得更有道理了，而是因为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对新的思想资源的社会需求，同时印刷术的普及使古籍的传播成本大大降低。

“从上层建筑中被重新释放出来的、属于旧经济基础的劳动力潜能”——这不是说上层建筑中只有旧经济基础的潜能，而是说上层建筑作为历史性凝结，主要存储的是那些在旧经济基础条件下被雪藏的潜能。这些潜能带着旧时代的烙印——它们可能体现为前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审美偏好、认知框架。但当它们被重新释放时，它们不是简单重复旧时代的内容，而是在与新条件的碰撞中发生转化、变形、升级。

“以新的形式作用于新的经济基础”——被释放的潜能不会原封不动地嵌入新的经济基础。它必须经过筛选、改造、重组，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水平。封建时代的平等观念在被资产阶级继承时，被剥离了其封建外壳，注入了商品交换的平等逻辑。空想社会主义的构想在被马克思主义改造时，被从道德批判转化为科学分析。这种“形式的更新”本身就是意识活动——是活的人的意识在对历史遗产进行批判、取舍、重构。

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完整机制：

当下的经济基础通过“释放/雪藏”机制，将无法容纳的劳动力潜能凝结为上层建筑；当

---

---

技术和生产条件进步到一定程度，这些被雪藏的潜能被重新激活，以经济力量的形式作用于新的经济基础。

这个机制有四个关键环节：雪藏（经济基础划界）→ 凝结（潜能固化为上层建筑）→ 条件成熟（技术进步）→ 释放（潜能被激活，反作用于新经济基础）。每一个环节都是物质性的、可分析的、不依赖于“观念的神秘力量”的。

为了检验这个机制的解释力，我们可以用最经典的案例——欧洲文艺复兴——来做一个快速的验证。

文艺复兴的上层建筑是什么？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新发现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艺术、法律、科学，被欧洲人重新翻开、重新翻译、重新阐释。

这些文化产品是怎么来的？它们是古希腊罗马经济基础的产物。在那个奴隶制城邦时代，一部分人被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的意识有更多余裕去探索哲学、艺术、科学。但这些探索的成果，大部分在当时是无法兑现为生产力的——古罗马的工程技术远超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水平，但当时的奴隶制经济无法将这些技术推广到全社会；古希腊的民主思想更是与中世纪封建等级制格格不入。因此，这些文化成果在当时就被“雪藏”了——它们以文献、建筑、雕塑的形式凝结下来，成为上层建筑。

这些潜能什么时候被释放？当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生产力开始复苏，城市兴起，商业扩张，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新的思想资源来冲破封建神学的束缚。意大利的商人和银行家需要不同于教会法的商业规范，新兴的城市需要不同于封建制度的政治组织形式，文艺复兴的艺术家需要不同于宗教题材的表现对象。于是，人们开始回过头去，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中寻找资源。

这些被释放的潜能以什么形式发挥作用？它们不是直接搬用古希腊罗马的现成答案，而是被改造、被转化。佛罗伦萨的市民从罗马法中找到了“共和”的理念，但他们建立的不是罗马式的奴隶制共和国，而是城市贵族和商人主导的城邦国家。文艺复兴的艺术从古希腊雕塑中学习了透视法和人体比例，但他们画的不再是希腊的神祇，而是圣母、商人、甚至自己的肖像。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创造性转化，正是活的人的意识在激活历史凝结时的典型表现。

这个释放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它塑造了新的主体——具有独立人格、追求世俗成功、敢于冒险和创新的“新人”。这些新人的意识和劳动力，成为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核心动力。文艺复兴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因，但它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思想条件——而这个“思想条件”的本质，不是观念本身的力量，而是被重新激活的、古希腊罗马时代被雪藏的劳动力潜能，以转化后的形式注入到新的生产方式之中。

这不是观念决定论。如果欧洲没有经历黑死病后的人口重组、没有远洋贸易带来的财富积累、没有印刷术带来的信息传播革命，仅仅靠“复兴古希腊文化”本身，不可能催生资本主义。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够发生并产生深远影响，是因为技术和生产条件已经进步到可以“接住”那些从前被雪藏的潜能。观念只是载体，真正的力量是劳动力潜能本身。

这个案例展示了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完整逻辑：旧经济基础中被雪藏的潜能→凝结为上层建筑→新生产条件下被激活→转化为新经济基础的动力。它不是观念的力量，而是经济的力量——是被固定下来的、跨越时代的经济力量。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经典命题的机制性重构。这一重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填补了一个理论空白，更在于它彻底消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心主义后门”。

在传统解释中，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反作用”，只要这个反作用的机制没有被揭示，它就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批评者可以说：“你们马克思主义者嘴上说经济决定一切，但一碰到文化、宗教、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认观念有独立的力量——这难道不是向唯心主义投降吗？”

---

---

这个批评之所以有杀伤力，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我们长期缺乏一个有力的回应。我们只能说“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经济基础是最终决定因素”——这个回应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在机制上是空洞的。它没有告诉我们“反作用”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因此也无法反驳“观念有独立力量”的指控。

而我们现在指出了这个缺失的机制：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旧经济基础中被雪藏的劳动力潜能，在新的技术和生产条件下被重新释放，转化为经济力量的过程。在这个机制中，没有任何环节需要诉诸“观念的神秘力量”。意识、观念、文化，都是劳动力潜能的载体和中介，而不是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能动者。当一个人被一个观念打动，不是因为他被某种精神实体“感染”了，而是因为他的意识在理解、消化、转化那个观念中凝结的前人经验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判断和行动能力。这个过程是物质性的，它发生在大脑中，表现为神经元的活动；它发生在社会中，表现为劳动效率的提高、生产组织的变革、社会关系的调整。

这面“承重墙”支撑的是整座理论大厦的上层结构。第一章论证了意识的双重身份和上层建筑的历史性凝结，第二章论证了反作用的经济本质和释放机制。有了这两章的地基，我们就可以在第三章进入最核心的支配逻辑分析——意识为什么不可剥削却可以被殖民？意识创造的价值与意识本身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在第一、二章中埋下了伏笔。现在，是时候把它们彻底展开了。

## 第三章 意识的边界：不可剥削，但可殖民

在《双重视阈》中，我们揭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用户在数字平台上的每一次浏览、点击、停留，都在为平台无偿生产数据资产，而用户本人却得不到任何报酬(张皓翔，2026b)。在《要素的枷锁》中，我们确立了另一个核心命题：意识本身不可剥削(张皓翔，2026a)。

这两个判断之间横亘着一道理论裂缝。如果意识不可剥削，那么数字资本在生活流域做的究竟是什么？如果那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如果那确实是剥削，剥削的对象又是什么？

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一直未能对两个根本不同的对象做出清晰的区分。当我们说“意识不可剥削”时，我们指的是意识本身——那个内在于人的、不可分离的、不可衡量的认知判断能力。当我们说“用户在平台上被剥削”时，我们指的是用户意识活动的外化产物——浏览轨迹、停留时长、互动记录、偏好标签——这些可以被记录、被提取、被占有的数据。两者不是同一个东西，却被同一个词“意识”所覆盖。

因此，必须将两者严格区分开来。意识本身与意识所创造的价值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对象，它们遵循不同的支配逻辑。意识本身不可剥削、不可占有、不可衡量、不可掌控，但可以被殖民；意识所创造的价值则可以被部分占有、部分掌控、被剥削。这一区分不仅能够化解《要素的枷锁》与《双重视阈》之间的表面矛盾，更能揭示数字资本主义支配机制的深层结构——殖民与剥削如何相互缠绕、彼此强化，却始终保持着不可还原的边界。

### 第一节 两个世界：意识本身与意识的产物

意识本身，是人的大脑在实际劳动过程中所调用的认知、判断、决策、审美、赋予意义的能力。它内在于人，与人的生命活动不可分离。你无法把它从人的大脑中抽出来，像搬走一块砖一样搬走它。它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种能力、一种机能、一种活的、流动着的、每一次调用都独一无二的精神活动。当一个人在做判断时，这个判断活动本身——那个瞬间的权衡、那个瞬间的抉择、那个瞬间的意识涌现——是无法被拿走的。你可以拿走他判断的结果，但拿不走他做判断的那个能力本身。

---

---

意识所创造的价值，则是意识活动的外化产物。当一个程序员写出代码，代码就是意识创造的价值；当一个工程师画出图纸，图纸就是意识创造的价值；当一个用户在平台上浏览、点击、停留，产生的数据就是意识创造的价值。这些产物一旦被生产出来，就从意识活动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于原初意识活动的存在。代码可以被复制，图纸可以被传阅，数据可以被提取。它们是“物”——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实体，但具有物的基本特征：可分离、可占有、可衡量。

剥削与殖民这两种支配形式的分野，正是建立在这个区分之上。

剥削，是对劳动产物的无偿占有。剥削的前提是对象可以从劳动者身上分离。工厂中生产出来的商品可以被拿走，办公室中产出的方案可以被公司拥有，平台上产生的数据可以被提取。凡是可以被剥削的东西，一定是可分离的、可占有的、可衡量的。分离性是剥削的前提条件——没有分离，就没有占有；没有占有，就没有剥削。

殖民则完全不同。殖民不占有对象，而是侵蚀主体的自主调用能力。殖民不夺走你的判断力，而是让你“自愿地”把判断力投向资本预设的方向；殖民不没收你的注意力，而是让你“主动地”把注意力交给算法调度；殖民不控制你的欲望，而是让你“自由地”渴望资本为你准备好的东西。殖民的对象不是可以分离的“物”，而是内在于人的“能力”——那种调用意识、支配注意力、做出自主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无法被占有——你无法像拿走一块石头那样拿走一个人的判断力。但它可以被驯化、被引导、被编程、被殖民。

混淆这两种支配形式，要么会把殖民误认为剥削——从而误以为只要消灭了剥削，殖民就会自动消失；要么会把剥削误认为殖民——从而看不清资本对劳动产物的占有仍然是最直接的掠夺方式。只有区分清楚，才能看得清：资本在生活流域做的事情，是对意识产物的剥削，同时是对意识本身的殖民。前者是显性的、可指认的、可以用传统政治经济学范畴分析的；后者是隐性的、弥散的、需要新的概念工具来把握的。

## 第二节 意识劳动力的独特性：非线性与不可衡量

要理解意识这种特殊劳动力的独特性，最好的方式是与普通劳动力做一个对比。

普通劳动力——体力、重复性技能、标准化操作能力——具有一个根本特征：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线性关系。你搬砖，搬十块砖和搬二十块砖，体力支出大致是两倍关系，产出也是两倍关系。你操作机器，操作一小时和操作两小时，产出也大致翻倍。正因为这种线性关系，普通劳动力是可衡量、可计算、可掌控的。泰勒制用秒表测量工人的每一个动作，将劳动过程分解为可计量的单元，就是因为普通劳动力的投入可以用时间来度量，产出可以用数量来度量，效率可以用单位时间产出率来度量。资本可以建立一个清晰的公式：投入多少劳动力（以时间为单位），产出多少价值，剩余价值是多少。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普通劳动力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这种可度量的线性关系，对普通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剥削，也就意味着对劳动力本身的掌控与占有。资本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产品，也就占有了工人的劳动时间；资本占有了工人的劳动时间，也就占有了工人在这段时间内的全部劳动能力。产品的占有与劳动力本身的占有，在普通劳动力的领域中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就是为什么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剥削”这个概念足以涵盖资本对劳动者的全部支配关系。

意识劳动力打破了这个线性关系。

意识的核心特征是：投入与产出之间不存在稳定的线性关系。一个关键的判断可能只需要一秒钟，但它可能决定一个项目的成败，影响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价值。一个创意可能在一瞬间闪现，但它可能开启一个全新的产业。反过来，一个人可能花费数年时间冥思苦想，却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也没有产出。意识的投入端无法用时间来度量——一个天才的一秒钟可

---

---

能抵得上庸才的一年；意识的产出端也无法用数量来度量——一个判断的质量不是能用“产出了多少个判断”来衡量的。

这种非线性关系，意味着意识的产物无法被还原为意识的投入。你无法说：“张三投入了X单位的意识，产出了Y单位的价值，剥削率是Z%。”因为投入端没有一个可计量的单位，产出端也没有一个可与投入端建立函数关系的尺度。意识劳动中没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因为同样的判断，对一个人来说可能瞬间完成，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永远做不到；对同一个人来说，此刻可能灵光一现，彼时可能绞尽脑汁也无果。它不是时间可以度量的。

因此，意识本身不可衡量、不可计算、不可掌控。这不只是一个技术难题——不是说现有的测量工具不够精密，将来或许可以测量。这是质的规定性。意识的每一次真实调用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携带着调用者的全部生命史、不可复制的经验积累、以及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的那个无法被事先编程的“跳跃”。这种独特性拒绝被纳入任何统一的度量衡。

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后果：对意识所创造的价值剥削，并不意味着对意识本身的掌控与占有。资本可以拿走程序员写出的代码，但拿不走程序员写代码的那个能力本身；资本可以提取用户在平台上产生的数据，但提取不了用户产生数据的那个意识活动本身。产品被占有了，但生产产品的能力仍然在劳动者身上，没有被占有。这在普通劳动力的领域中是不可思议的——在工厂里，资本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产品，也就意味着资本占有了工人的劳动时间。但在意识的领域中，这种对应关系断裂了。

这解释了为什么数字资本对意识产物的剥削呈现出一种“没完没了却永远填不满”的特征。资本占有了数据，但数据只是意识活动的外化痕迹，不是意识本身。资本无法通过占有数据来占有那个产生数据的意识能力，因此它必须不断地、持续地、一刻不停地继续剥削——因为一旦用户停止产生新数据，资本的占有就只剩下一堆过时的、不再增值的旧数据。剥削意识产物，不等于控制了意识本身；占有了昨天的数据，不等于能占有明天的数据。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永远需要重新开始的过程。

更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对意识价值的剥削、占有和掌控，只能是局部的。资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占有了多少。在工厂里，资本家清楚地知道一个工人一天生产了多少件产品、剩余价值是多少。但在数字平台上，资本无法知道一次用户的浏览行为究竟有多少“意识含量”。平台知道自己收集了多少条数据，但它不知道这些数据中真正“值钱”的是哪一条，更不知道每一条数据对应的意识投入有多大。平台无法区分，也不关心——它只需要数据量。但这种“不关心”恰恰说明了剥削的局部性：资本占有的只是数据这个外壳，而数据中可能包含的、真正具有高价值的意识投入，大部分在剥削中被漏掉了。

然而，局部性和不确定性绝不等于价值小。恰恰相反，资本殖民意识所获得的数据价值，其来源是全体人类——理论上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活着的瞬间，都在产生数据。这个基数近乎无限。即使单位价值极低，乘以近乎无限的人类生命时间，总价值也是天文数字。资本不确定自己占有了多少，不等于它占有的价值少；资本算不清这笔账，不等于这笔账不值得算。事实上，正是因为它无法精确计算，它才更需要通过无限扩张的规模来弥补单次剥削的不确定性。这是数字资本泡沫繁荣性的深层根源之一。

### 第三节 殖民的逻辑：双重收益与战略掌控

既然意识本身不可被剥削、不可被占有、不可被衡量、不可被掌控，那么资本还能对意识做什么？答案是：殖民。

剥削与殖民的区别可以这样理解：剥削是“拿走你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殖民是“让你在还没开始生产的时候，就已经在为资本服务”。剥削发生在产物被生产出来之后；殖民发

---

---

生在意识被调用之前——它预设了意识的方向、规定了注意力的投向、限制了判断的选项、驯化了欲望的对象。

殖民不夺走你的判断力，而是让你“自愿地”把你的判断力投向资本预设的方向。它不是强迫你——强迫反而会引起反抗——而是通过算法推荐、成瘾设计、信息茧房、绩效规训，让你在每一次调用意识时，都自然而然地、不假思索地、甚至愉悦地流向资本为你准备好的方向。你仍然觉得是你自己在做决定——这正是殖民最精妙的地方。你以为是自己想刷视频，实际上是算法在你想刷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你“会想刷”的内容；你以为是自己对某个产品产生了兴趣，实际上是推送机制在你意识到之前就已经计算出了你的“兴趣点”；你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实际上你的自由被精确地限定在资本为你划定的轨道之内。

殖民的狡黠之处在于：它不需要占有意识本身，只需要占有意识调用时的“方向选择权”。它不是控制你“能不能想”，而是控制你“想什么”。它让你在思考之前，就已经被引导到了资本希望你思考的方向。它让你在判断之前，选项就已经被筛选过了。它让你在欲望产生之前，欲望的对象就已经被准备好了。意识本身的自主调用能力没有被夺走——你仍然可以思考、可以判断、可以欲望——但每一次自主调用的起点和方向，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殖民了。

那么，资本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地殖民意识？答案有两重，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第一重收益：直接的、可剥削的数据价值。当用户的意识被成功引导，产生更多的浏览、点击、停留时，平台就能收集到更多的数据。这些数据本身就是价值——可以被用于训练算法、优化推荐、精准营销、信用评估。虽然资本无法精确知道每一条数据值多少钱，虽然这种剥削是局部的、不确定的，但它的价值来源是全体人类生命时间，基数近乎无限。即使单次剥削的价值极低，乘以数十亿用户乘以每分每秒的持续产出，总价值是巨大的、真实的、不可忽视的。资本殖民意识，首先就是为了这巨大而模糊的利润——它不确定自己拿到了多少，但它知道自己在拿，而且拿不完。

第二重收益：战略层面的掌控。比数据价值更深层的，是殖民意识使得资本能够实现劳动者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系统性支配。意识是劳动力再生产全过程的“总开关”。你今天选择学什么技能，取决于你的意识被什么方向所吸引；你今天在工作中投入多少精力、以什么节奏劳动，取决于你的意识如何被当下的目标和压力所引导；你今天在休息时选择做什么、是否真正恢复，取决于你的意识在闲暇中被什么所填充。资本不需要直接命令你，它只需要殖民你的意识——通过教育系统中的“热门专业”叙事、通过职场中的绩效排名和即时反馈、通过生活平台中的算法推荐和成瘾设计——让你的意识“自然而然”地流向资本预设的方向。当你的意识被成功引导，你自己就会主动去学那些资本需要的技能，你自己就会拼命加速以追赶 KPI，你自己就会在碎片化娱乐中消耗掉本应用于真正休息的时间。

这两重收益不是主次关系，而是同一过程的两面。数据价值是直接的、可量化的（虽然不确定）、来自全体人类生命时间的巨大财富；战略掌控是深层的、根本性的、确保了劳动力再生产全过程服从于资本逻辑的权力。资本既是为了那巨大的数据价值而殖民意识，也是为了通过殖民意识来实现对劳动力生命周期的全面掌控。缺了任何一面的理解，都是不完整的。

至此，意识这一人类最高级、最特殊的劳动力，同时作为人类社会最核心的上层建筑，终于被我们从观念的神秘化中请出，让它以一个赤裸的身姿再次站在了人们面前。这是从“人要认识你自己”，到“人要发现你自己”，再到“人要选择你自己”，最后迈向“你要掌控你自己”的关键一步。

---

---

## 引用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恩格斯. 致康拉德·施米特[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张皓翔 . 要素的枷锁 [EB/OL]. 日内瓦 : Zenodo, 202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753290>

张皓翔 . 双重视阈 [EB/OL]. 日内瓦 : Zenodo, 202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79332>

## 备注

本书定性为《要素的枷锁》补充,因理论逻辑的完整性而单独成册。其写作目标不是文献综述,而是机制建构。书中仅直接引用最基础的经典文本及作者前作,未对当代相关研究(如认知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非物质劳动理论等)做逐一对话。这不意味着忽略它们,而是为了保持论证的紧凑与锐度。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将这些讨论与本书框架对照。本书不求形式上的“学术规范合格证”,但力求提供一个值得被讨论、被检验、被发展的理论起点。